

万教联合：论民初尚贤堂的宗教网络与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饶玲一

辛亥革命以后，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颠覆导致文化道德秩序的失衡。与此同时，各种思想、文化交替涌现，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面向。儒、释、道、回、基督等各教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试图以振兴宗教来对抗社会道德的失堕和信仰的真空。在此期间宗教界刮起一股“各教联合”的潮流，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中外各士绅捐款兴建的文化机构尚贤堂，¹成为各宗教谋求共识的场域，通过集会、演说等多种形式，以各自信仰为出发点，阐发教理，讨论时局，希望通过“舍异从同”，求得一种能够令“各教合一”的方式来调和各教。这场讨论从1910年延续至1927年，对这场宗教对话运动的考察，帮助我们理解各宗教在清末民初这一剧烈动荡、变革的历史时期，形成一种既为竞争对手，同时在交流中汲取精华的微妙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宗教乃至中国文化在现代意义上的转型。

一 宗教联合及其背景

1910年前后，李佳白在董事伍廷芳、吕海寰、盛宣怀、周舜卿等人建议下调整机构设置，组成学务、商务、教务、女士四个联合研究会。²除定期在沪上为中外上层人士举办社交活动外，由四个研究会组成的中外联合公会成为尚贤堂面向公众的主要活动场所。四个研究会中，由儒、释、道、回、基督、印度、婆罗门、东正教等宗教人士及宗教团体组成的教务联合会成为机构中活动最频繁、持续时间最久、社会影响力也最为深远的分会。尚贤堂的办会宗旨在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亦有所调整，逐渐从“中外人士会晤之所”转向“万教联合之地”。

在谈到这番变化时，李佳白指出：

近两年来，各宗教界思想日益发达，知非联合各教，不足以有所为，于是各教首领，多乐与本堂表同意……本堂发生之新希望也。³

李佳白这番话反映出辛亥革命之后宗教思想的蓬勃发展以及各教试图合作、对话

¹ 尚贤堂成立于1897年，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Rev. Gilbert Reid）在北京创建，1900年后迁址上海，是一所面向中外士绅，以协调中外关系、调和中西文化冲突为目标的文化团体，由于汇聚众多官商、士绅、学人在其中活动，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文化交流机构。详见拙文《都市空间和中外对话：近代上海的尚贤堂》，《文汇报》2013年7月16日；《“联络中西，调和各教”——李佳白与上海尚贤堂》，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2011年第10辑。

² 《历年办理纪略》，《国际公报》1923年第16期。

³ 《本堂总理第三十一次之半年报告》，《尚贤堂纪事》1913年第12期。

的新趋势。尚贤堂转向各教联合有双重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道德秩序的失堕，另一方面则是宗教各界应对信仰危机的迫切回应。

民国建立之初，传统政治结构随满清皇权崩溃而迅速解体，相伴而来的乃是传统文化以及道德秩序的破坏与颠覆。尚贤堂人士对革命发生后的时局的观感是“政治停顿、民生凋敝”。¹著名的官绅、尚贤堂董事沈敦和不止一次流露出对此现状的忧虑，他指出当时社会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即：

外人之宗教既格不相入，而已国之古道德又吐弃之民，人无范围不过之，
则无造次不离之，经而惟是逞自由，口说以肆意妄行，宁我负人无人负我。
在面临此种两难的境况时，沈敦和也注意到当时社会对科学的过分推崇而忽视道德的现象：

吾恐科学日进，机械日深，生人之具假以杀人，物质虽明用违其当，非
特尽失强国保种之初心，亦将复返于洪水猛兽之世界矣！²

可见民国建立之初，虽然政治仍旧动荡，社会风气却转变迅速而明显。从晚清到民国，知识精英从最初对基督教的攻击和反抗转向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一切宗教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唯物论，认为不论宗教还是哲学，都是随物质的变动而变动，物质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体；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所有宗教都是违背科学，妨碍个人智能的自由发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理性与科学不仅可以使人脱离宗教与迷信的束缚，而且能够协调人际间的关系，其能力远甚于宗教；而自由主义者，也是深受科学的影响，基于科学与实证主义，基本上是拒斥相信任何超自然的神圣存在。³凡此种思潮造成的风气和人心的转变令各教人士感到错愕而且焦虑，不得不积极寻求应对的途径。1911年后，“如何挽救世道人心”便成为尚贤堂内的宗教人士普遍关切的议题，孔教、基督教、儒教、回教等各派人士秉持平等、容忍、聆听原则，以各自宗教信仰为出发点为社会道德沦丧等出谋划策，试图找到救世的方法。

针对新起的反教潮流，汇聚于尚贤堂内的各派人士认为“文明进步，道德浸衰，政治法律之能力有时用亦有时穷”，主宰文明世界的应是宗教。⁴他们视宗教“原为人类所同具之心理，不待矫揉造作而成，盖为人性本善”，宗教的功用在于“引导人心入于高尚之法”，留存善恶，同时也是改良社会的原动力。⁵他们进而认为：

¹ 《纪本堂开新年茶叙会事》，《尚贤堂纪事》1914年第1期。

² 《论道德心与科学之关系宜亟谋德育以防人民日即于非行》，《申报》1906年11月19日。

³ 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VI-XI页。

⁴ 《论宗教大同说》，《尚贤堂纪事》1913年第13期。

⁵ 《纪中外教务联合会第十六次会议事》，《尚贤堂纪事》1913年第2期。

国家当大改革之时，宗教问题尤关切要，因秩序已被改变破坏，则宗教或亦有被改变破坏之处……中国现在正当改革，大都谓与宗教无与，不知宗教既根于人性，则与人类之进化必有特别之关系。¹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尚贤堂人士对世事变化的剧烈有深切认知。因此，“欲正人心，非提倡道德以各教真理宣化不可”。他们认同无论哪种宗教信仰，都具有拯时救世的普遍意义，即所谓“教也者，纯粹以天理为太原，而以救世为目的者也”，尽管“世界各教之形式各有不齐”，但“准之以天理则同”，尽管“世界各教之精神亦万有不齐”，“而致力于救世则一”。² 有了这种对宗教普遍意义的认知，宗教界的联合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显得刻不容缓。

二 宗教网络的集聚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将活跃在尚贤堂内的各宗教人士称为“改革派领袖”，³通过对尚贤堂教务联合会材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发现，这个宗教网络是由当时在华各个教派中思想开放的人士组成，称之为“改革派”正是恰如其分。来自基督教的李佳白、李提摩太、丁韪良、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莫安仁（Evan Morgan），孔教会的陈焕章、姚菊坡、姚文栋、沈曾植、戈朋云、王振民，回教王宽、马善亭、哈少甫，佛教的太虚、觉民、月霞，道教赵秋水、张元旭，另有热心宗教问题的官绅沈敦和、伍廷芳等人。

在这一多宗教团体构成的网络里，基督新教中的自由派仍居于主导。由于传教方法、策略、对象以及目标上的差异，近代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被划分为基要派、保守派、自由派、福音派四类。⁴这四类中，又可归并为基要派和自由派、或称保守派和现代派两类。总的来看，基要派坚持以纯粹的教义引导教徒的皈依，自由派则主张“通过渐进的教化和传布福音”；基要派热衷于救灵，自由派积极参与社会。⁵ 基要派与自由派是分属基督新教内部几乎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自由派常常受到秉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的诘难，但却在吸引中国社会精英人士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李佳白、李提摩太、丁韪良传教士都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国文化价值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肯定。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丁韪良主张“孔子加耶稣”，李提摩太则长期致力于宗教间的比较研究，曾深入研究

¹ 《纪中外教务联合会第十六次会议事》，《尚贤堂纪事》1913年第2期。

² 《论中国各宗教之危机》，《尚贤堂纪事》1916年第2期。

³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340页。

⁴ Paul A. Warg, “A Survey of Changing Mission Goals and Methods”, Jessie G. Lutz,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 D. C. Heath & Co. 1966, pp5-6.

⁵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35页。

佛教经典，并同杨文会合作将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¹他们抱有开放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致力于宗教与文化之间的调适。以尚贤堂为中心而构建的宗教网络正是建立在这批传教士以积极而主动的心态尝试了解和接纳其他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利用以尚贤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一宗教对话的网络方面，各宗教仍有不同的目标和立场。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孔教会运动。陈焕章、姚菊坡、沈增植等孔教会人士也是参与尚贤堂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一度将尚贤堂作为宣传孔教运动的重要阵地，并试图用宗教化的概念来推动“孔教”的振兴。²在陈焕章等人主导的“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中，尚贤堂成了各教派展开激烈论辩的场域，来自孔教会、基督教、道教、天主教等各方代表对此问题分别表明立场。1913年，陈焕章等要求国会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遭到否决，但孔教国教化的呼声并未因此稍歇。来自孔教会内部人士王声莠坚持认为，定孔教为国教无妨于信教自由，他表示孔教早已是事实上的国教，宪法的国教提案不过是将这一历史事实变成法律具文而已。在他看来，信教自由并不限制确立国教，两者不相矛盾，而西方国家明定国教的在在皆有。³孔教运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舆论的支持上，并希望这种舆论能影响到宪法中有关宗教的条文。虽然陈焕章等人的立场并未在尚贤堂的讨论中获得各教的普遍支持，但尚贤堂作为孔教会成员及其同情者探讨孔教以及与其他宗教对话的平台则作用非常突出。⁴此外，在这批孔教运动的发起者心中，往往有意识抑或潜意识地将近代西方社会中基督教的模式作为参照体来考量，这也使尚贤堂成为一个合适的交流场所。

李佳白的宗教观点和尚贤堂对近代回教改革的影响也相当明显。王宽、马善亭、哈少甫等知识分子均属于思想开明的回教改革派，他们长期与基督教保持对话。据学者研究，李佳白在北京时，就常去牛街礼拜寺与王宽座谈。1902年尚贤堂迁沪后，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未中断。1914年，王宽以回教改革组织回教俱进会的创办人之一及其北京总会长的身份，来上海宣传回教改革。期间他在马善亭陪同下前往尚贤堂演讲。⁵王宽属于回教改革运动的核心人士，思想开明，因此与李佳白契合。这些举动都说明这批回教知识人开始打破以往不与外界沟通的保守立场，利用尚贤堂作为和其他宗教沟通的渠道，并藉此实现回教内部

¹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45th Annual Report, 1921

² 关于康有为提倡孔教及其影响的分析，见黄进兴：《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古今论衡》第22期（2011）。

³ 《纪本堂教务联合会开国教讨论会事》，《尚贤堂纪事》1916年第11期。

⁴ 关于较为详尽的孔教会的研究，参见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又范玉秋《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但这两部著作基本都未能注意与尚贤堂有关孔教的讨论的资料。

⁵ 相关信息参见马景《宗教对话中的马善亭阿訇》，《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1期。

的改革。1924 年尚贤堂的机关刊物《国际公报》刊载了一位回教徒孙伯恒的投稿《我的回教观》，里面批评中国的回教徒不重视现代学问，有遭淘汰之运命，需要“赶紧开放门户，吸收种种新文化以补充本教的精神。一面用本教的精神救治中国的病根，使我中华民国得跻于强盛之域，那就是我们五族各教人民得大幸福了”。¹这些声音无疑来自回教内部，其意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 宗教对话：各教联合的形式

宗教对话是尚贤堂功能中最具有创造力的功能。这一由基督教主导的宗教大会有其鲜明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他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他宗教所带来的好处”。²这对处于竞争关系的各宗教而言不失为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各教需要摒弃“己教优于他教”的心理优势，去了解并认识其他宗教；另一方面，在了解和对话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进行宗教教义、原理的比较与阐释，若处理不好非但不能化解矛盾，反而会成为宗教冲突的导火线。因此这项活动需要依靠主持者李佳白本人居中平衡与调和，他的个人威信成为这一对话能如此有效并持续如此之久的一大保障。李佳白体现出来的两大特点是：对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尊重和能照顾到特殊历史文化境况的自由派宗教人士的立场。而这两个特点都和他秉持的宗教立场紧密联系。

在李佳白看来，宗教都有普世性的内涵，也就是有共通的“道”和“理”，他甚至用“条条道路通北京”来形容这种方向的同一。虽然就具体的实践形式而言，各宗教区别很大，甚至显得不相兼容，但我们可以通过追求宗教的普世性内涵来超越各宗教的排他性，也就是超越其“偏执之道”。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各教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欣赏对方的存在：

在各教之互明教理，互认规约，精美之旨，互为赞扬，外著之仪，互相敬礼，认各教为兄弟，共携手而进行，同为世界造和平之福也。³

他对这一立场的坚持即便在自由派传教士中都显得突出，这自然令其他宗教中的改良派人士对他产生好感。

总体来看，尚贤堂的教务联合会以演说会为基本形式展开讨论，内容主要围绕宗教原理的阐释、宗教与现实的关联、宗教对人性道德的影响、对其他宗教的理解等方面进行，归纳起来，即对宗教原理解释以及对他教的解读。王治心认为尚贤堂“用宗教比较的态度，来发挥基督教的优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仍未能

¹ 孙伯恒《我的回教观》（续），《国际公报》1924 年第 21 期。

²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 340 页。

³ 《本堂总经理第三十一次之半年报告》，《尚贤堂纪事》1913 年第 12 期。

概括尚贤堂宗教对话的全部内涵。¹ 在1913年4月15日到10月15日尚贤堂的半年报告中，将这段时间内教务联合会演说中较为重要的列出：²

表 4.1 尚贤堂 1913 年 4 月至 10 月教务联合会演说提要摘录

演讲人	演讲题目
王声剪	论孔教之结果
王声剪	再论孔教之结果
李佳白	论基督教祈祷之真意
马宜之	论回教祈祷之真意
顾竹侯	论孔教祈祷之真意
铁杰生 (Teje Singh)	论印度西克教之原理
赵秋水等	论道教祈祷之真意
李佳白	论各宗教祈祷之真意如何有相同之点
黄中央	论解除名相为联合各教之本
司格礼	论德皇平生对于宗教之态度与意见
梁幹臣	论春秋之大义
李佳白	论良心之作用
李佳白	论自由之理必不出真道之范围
李佳白	论大同之理与天道之关系
李佳白	论目前时事与天道人命之关系
李佳白	论各宗教之革命见解凡十一次

即便从这张很有限的名单中已经可以发现，尚贤堂提供的宗教话语，范围和角度已超出一般意义上当时国人熟悉的宗教层面。比如就涉及的宗教而言，宣传锡克教教理的活动就很不寻常，当在沪上举行这一活动时，“侨居本埠之印度西克教中士女到会者不下百数十人，对于本堂皆极感佩”。³ 就讨论的议题而言，有些属于演说者在他教启迪下对本教内涵的新诠释，比如对各教中“祈祷”概念的探讨，其中不光包括祈祷作为重要日常实践的基督教和回教，还包括了孔教中祈祷的观念，这显然是对儒学作出的新诠释。教务联合会往往以系列会议的形式，围绕一个主题展开，除了前面提到的“祈祷”这一主题外，还有“真宰”、“希望”、

¹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3 页。

² 《本堂总经理第三十一次之半年报告》，《尚贤堂纪事》1914 年第 1 期。

³ 《本堂总经理第三十一次之半年报告》，《尚贤堂纪事》1914 年第 1 期。

“革命”等主题，各教依据自身教理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比如对于“希望”这一概念，儒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的代表分别作了《论孔教之希望》、《论道教之希望》、《论回教之希望》、《论基督教之希望》等报告，而后李佳白感觉有些报告不尽合“希望”这一命题，于是请尚贤堂的王声翦再作《论希望之真诠》，以解释“希望”这一概念的本意及其对于宗教之意义。虽然这些讨论的方式有点命题作文的意味，但主题大都不是任意选择，而是能与尚贤堂的理念相结合。讨论本身固然有回避各教之间立场截然相反的议题，但也不能说是肤浅之论。

李佳白是这场宗教对话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的组织才能，从话题的选择到探讨范围以及“度”的把握是宗教对话成功并得以延续的关键，而他本人的演说也是引发各教派讨论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他的演说涉猎的范围很广，并不局限于宗教问题，但大都以寻求宗教的启发和帮助为旨归。其中最重要是1915年由波士顿宏量派（The Unitarian Association of Boston）人士璧令司赞助的璧令司系列讲座（Billings Lectureship），由李佳白主讲。赞助人希望的主题是从宏量派角度“赞成他教，以企大同之尾声”。李佳白自己说他在“竭思殫力，至于终年，遂觉得理愈多，味亦无穷。”¹由此发表“外人如何赞成佛教之理由”、“外人如何赞成孔教之理由”、“外人如何赞成回教之理由”、“外人赞成道教之理由”等演说。

在这一系列演说中，李佳白对中西几大宗教的关系发表了直截了当的看法。针对民国以来孔教与基督教的竞争关系，李佳白表示，“固不可崇孔而黜耶，亦不能崇耶而黜孔”，“孔耶两教，克己复礼，仁民爱物之道”乃是共通的。²在《论回教》长篇演说中，李佳白则表示，“回教为各大教之一，且与波斯教同为基督教之分支，故其理多与基督教相似而不同。”在比较基督教与回教的异同时，李佳白揭明“基督教人心必当赞成回教，以回教最敬基督救主，特异于他教也”，而“回教以祈祷礼拜为唯一之要务”的习俗与基督相同。³这一系列演讲影响颇大，各教代表接受尚贤堂邀请作出回应。

凡此种种讨论内容，最核心的要点，即各教如何谋求共识？理想是各教表现出对“宗教大同”观念的认可，各教派通过对这些议题的陈述，一方面宣扬教义，消除教外人士对本教的隔阂和误解，另一方面在阐释教义的基础上，以比较的方法认识其他宗教，这样的方式对消除教与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一定作用。1913年桑德兰来到尚贤堂演讲，宣扬“宗教大同”思想，他将其归纳为三点：

一、各教皆将抉示其原有之教理，可以分饷同人，为各教得互相承认、

¹ 《论以宏量的态度对待他教其影响于传教之职务者若何》，《尚贤堂纪事》1915年第10期。

² 《论本堂之办法如何可以证明芳斯博士之说》，《尚贤堂纪事》1913年第5期。

³ 《论外人赞成回教之理由》，《尚贤堂纪事》1915年第7期。

推许之地；二、当汇各教之要理，取其同而略其异，删其奇而存其常，以为统一宗教之根基；三、世界各教之情愫既通，爱敬互施，即当联合以谋启世界合一之文化。¹

尚贤堂开展的这场讨论，并不强求他人的皈依，而是寻求理解从而进一步达成共识，是相信无论哪个宗教，一定存在最基本的价值观，这是为人性所共有的价值基础，这种精神和理念，在百年后依然是世界所公认的普遍共识。

四 余论

1920 年代李佳白发表《二十年来宗教大同之趋势》一文，对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各大宗教发展进行了概述性的描绘，并对各教进行逐一评点。对于儒教，他一反过去高调的支持态度，甚至有些失望地表示近年来虽有改变，仍无兴盛之象，他还谈到佛教在中日两国颇有复兴之势，这同信奉佛教的人多为名流有关。他专门指出，回教开始注意“与他教人往来，承认天经并非仅包括在回教之内”，回教中人也承认“人之学问非仅天经也，必须研究各种科学，各国文字”，因此回教学校的功课也随之改革，回教青年变得怀有“宽宏之心思”。²虽然李佳白此文旨在说明各大宗教呈现出大同的趋势，无论他的此番论断是否正确，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论述中发现一点线索，即 20 世纪初年，各大宗教都到了亟需“变革”的历史时期，凡是“不改变者，则毫无进步，改变者益见发达”，这几乎成为各大教派内部进步人士的普遍共识，倡导宗教联合和平等对话，所实现的不仅是消除文化隔膜，同时也是在互相交流中汲取精华的自主行为。

¹ 《论宗教之宏量与世运之进行》，《尚贤堂纪事》1913 年第 12 期。

² 李佳白：《二十年来宗教大同之趋势》，《兴华》1924 年第 21 卷第 1 期。